

著名作家赵瑜 30年作品经典

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需要这样的作家
独立调查、切身体验、写我所见
不避讳，不虚谈，不遗忘

独立调查 启示录

修订
典藏本
附名家书评


赵瑜 / 著
寻找巴金的黛莉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014042575

I253
548
V2

著名作家赵瑜
30年作品经典
独立调查
启示录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 / 著



L253
548
V2



北航

C1729091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0140452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巴金的黛莉 / 赵瑜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著名作家赵瑜 30 年作品经典)

ISBN 978-7-224-11046-3

I. ①寻… II. ①赵…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855 号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 著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李向晨

封面摄影: 李向晨

责任编辑: 周远 李婷晓

装帧设计: 高洪亮 姚立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北京力信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94 千字

版印次: 2014 年 4 月第一版 201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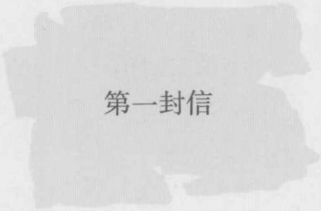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224-11046-3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 bwcq@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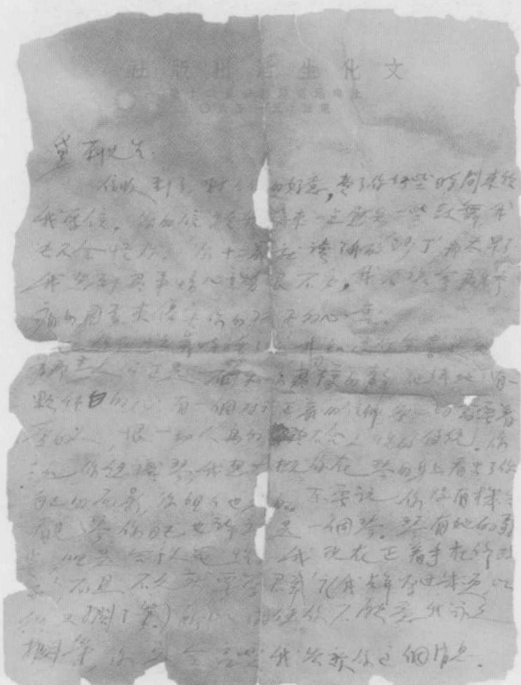
发货电话 010-88203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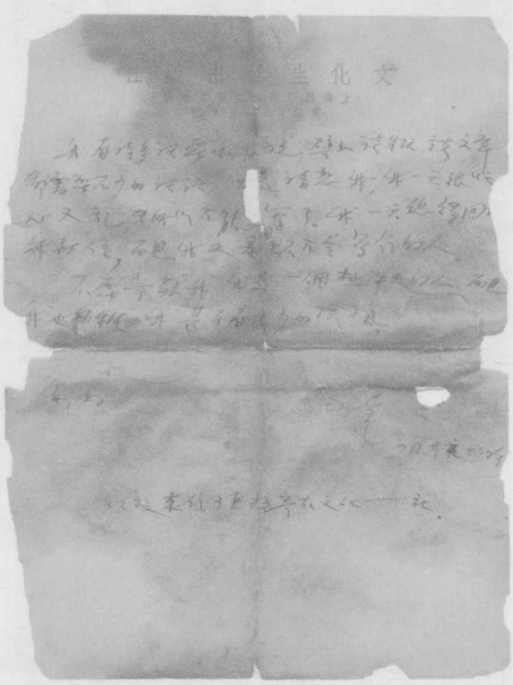
第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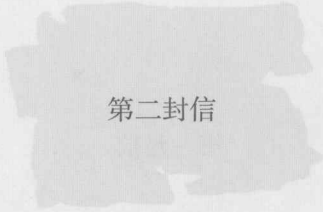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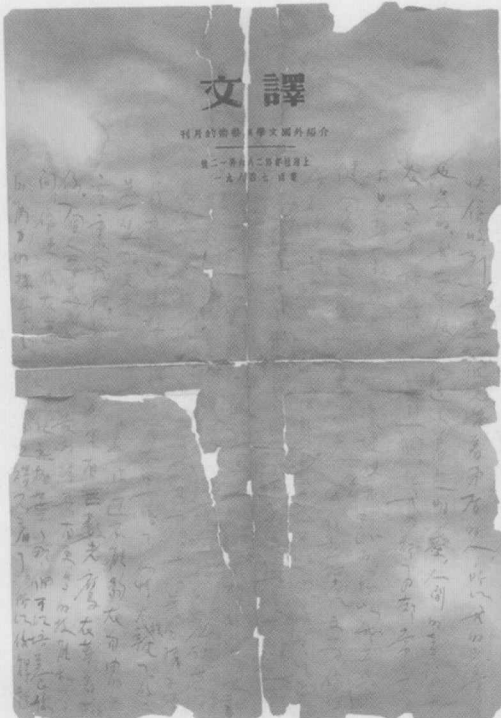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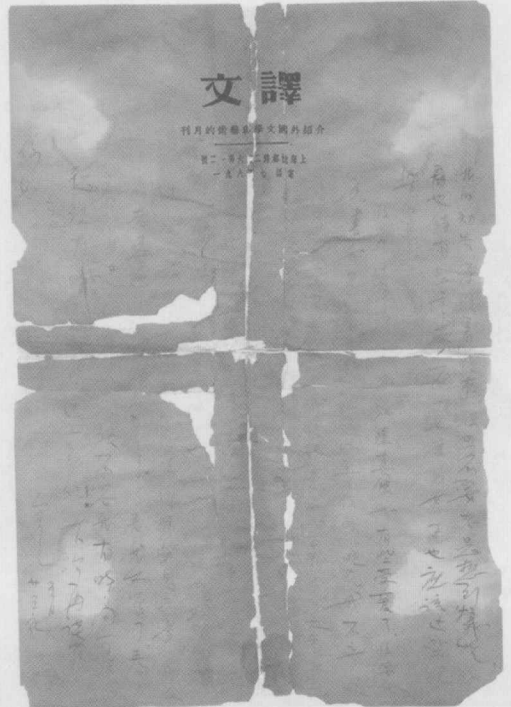
第二封信



2-1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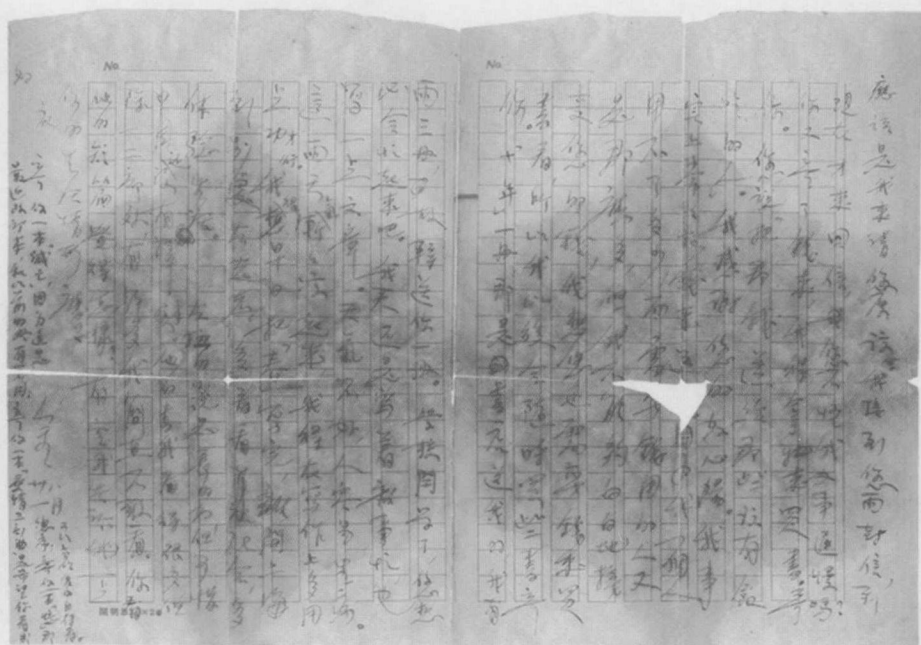


2-3

第三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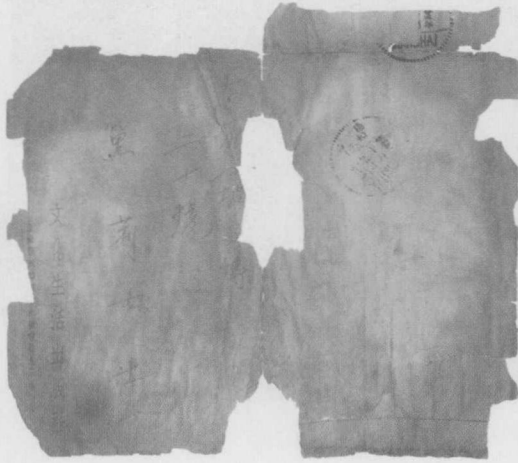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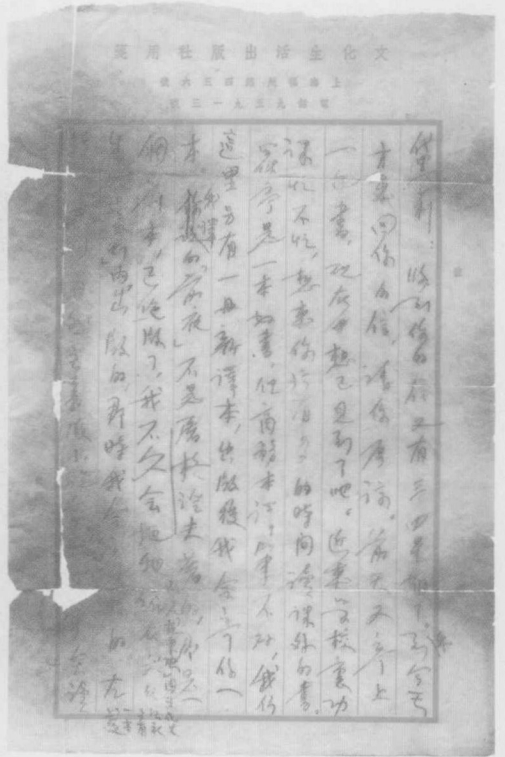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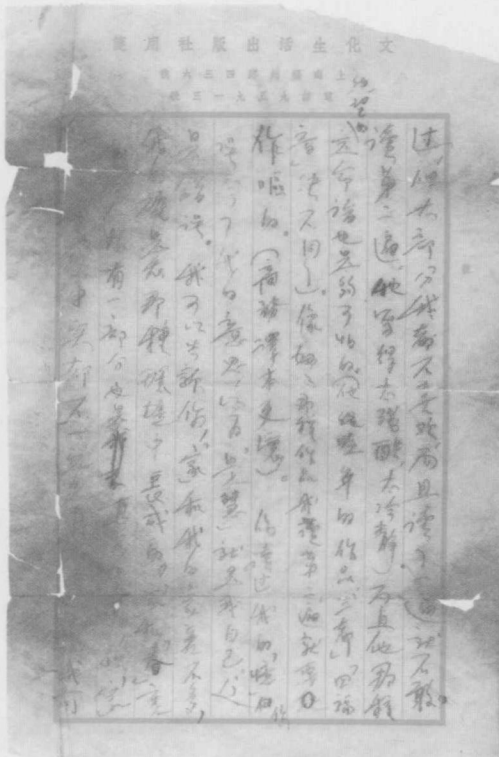
第四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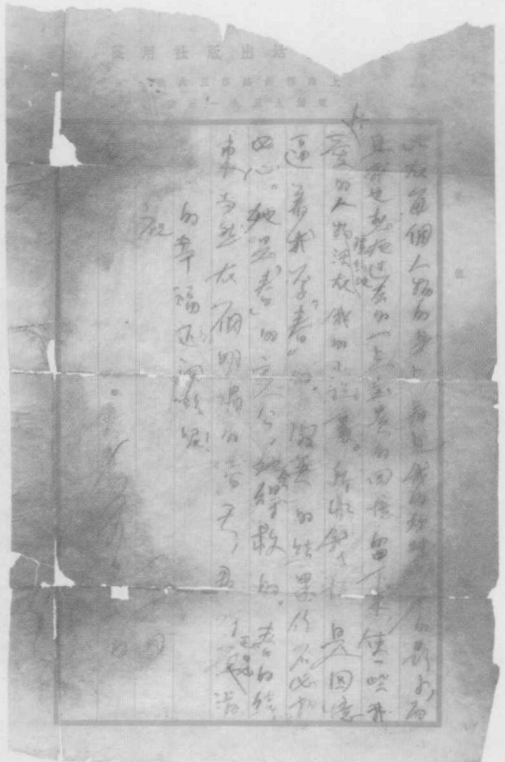
4-1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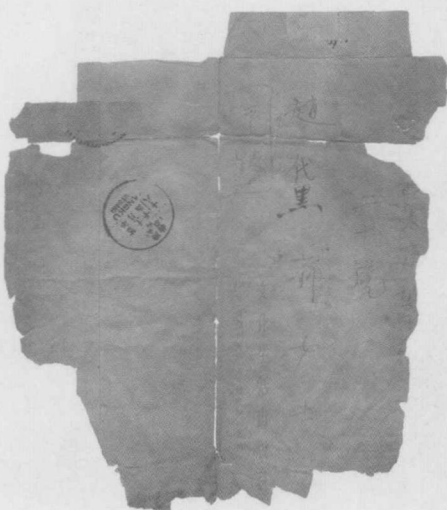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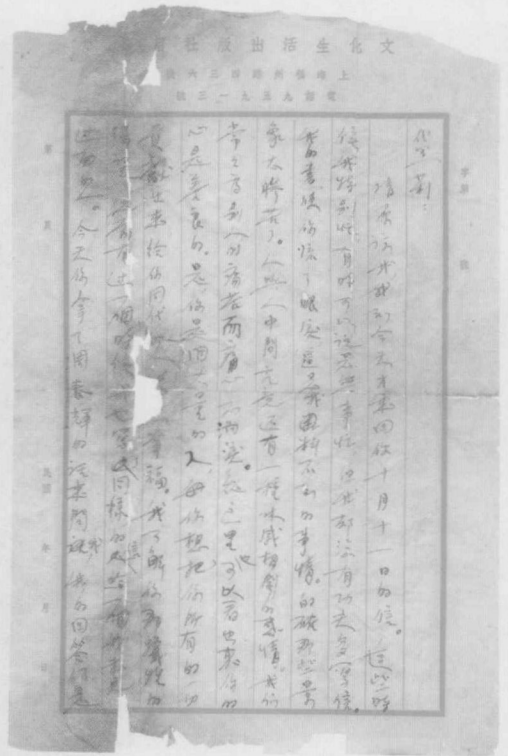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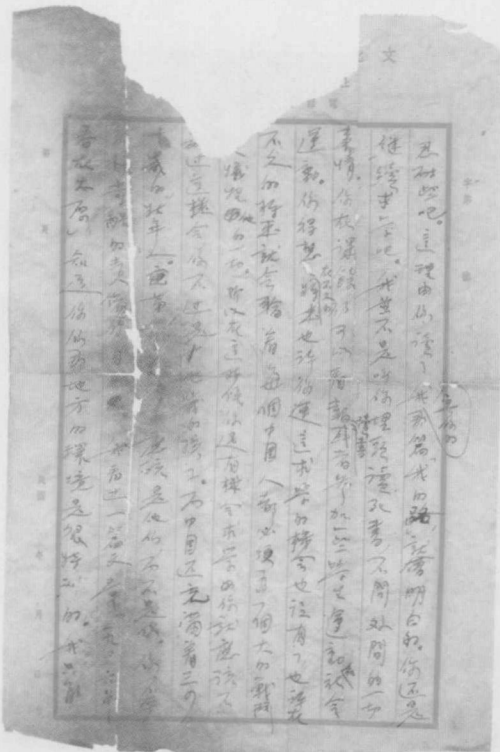
第五封信



5-1



5-2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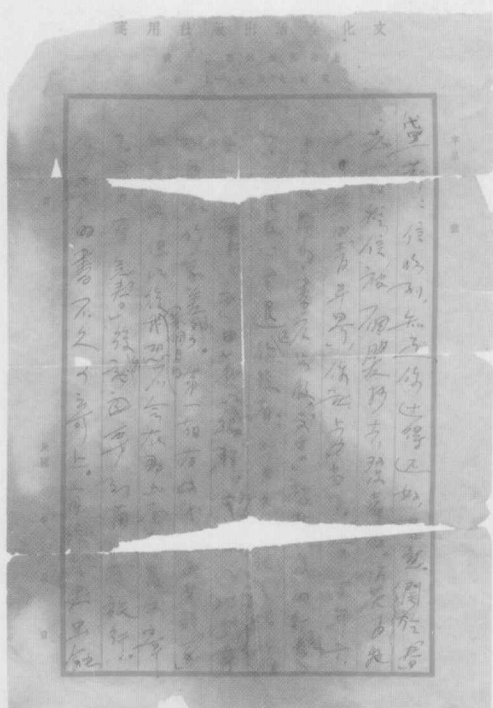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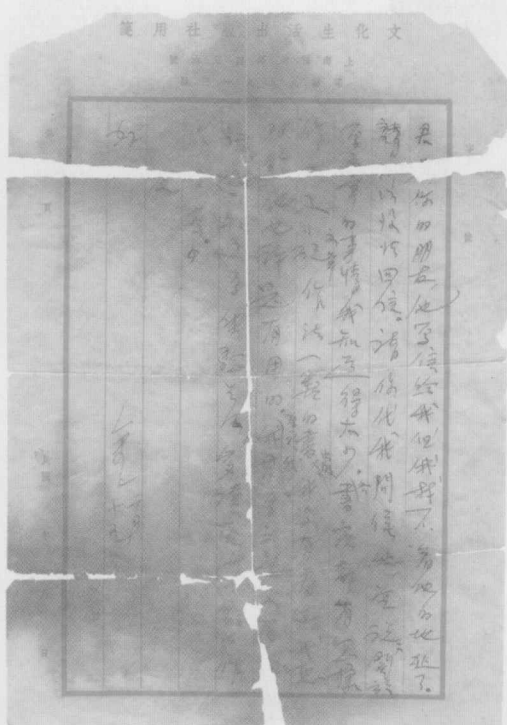
第六封信



6-1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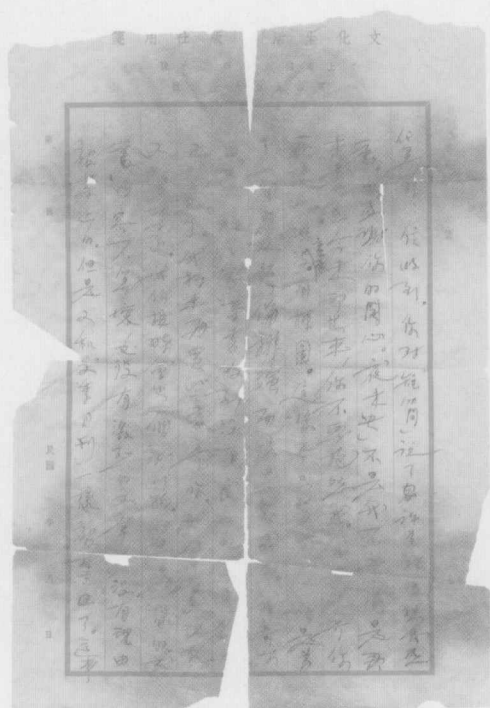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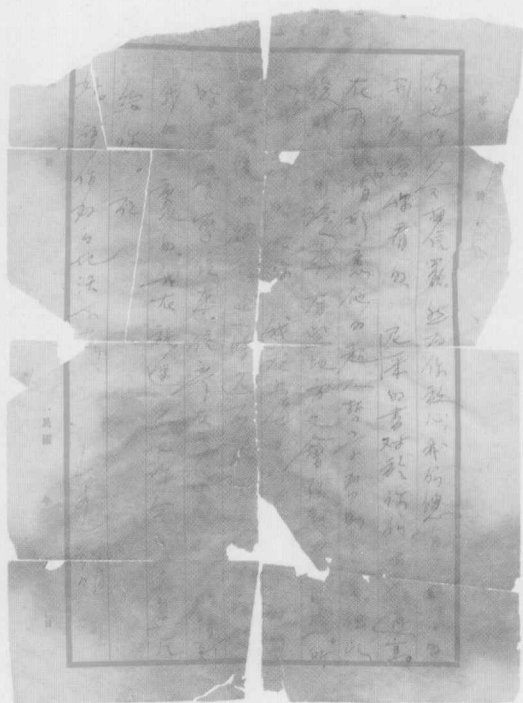


第七封信

7-1



7-2



7-3

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

——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节选）

赵 勇

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作时间长——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25个年头，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据笔者粗略统计，赵瑜笔下可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与此同时，赵瑜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精致，业已形成了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把赵瑜的报告文学置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场”中，该如何定位？

赵瑜报告文学的根在哪里？为什么赵瑜的写作能够长盛不衰？凡此种种，大都可以在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框架中找到某种答案。

体制批判：文学公共性的彰显

在报告文学领域，赵瑜成名于《中国的要害》（1986），名声大振于《强国梦——打开沉重的体育之窗》（1988）和《兵败汉城》（1988）。也就是说在80年代，赵瑜已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历史舞台。整个80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开始关注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另一方面，此类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从政治、社会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试图揭示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报告文学写作者作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与写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

赵瑜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而他一出手，就进入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阵营；他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要害》面世后，当时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谢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作品所渗透着的“参与意识”，并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对报告文学从高层次宏观展示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启示性；二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这一趋向具体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直接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渗透到报告文学中，既写

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于对所描写的事件进行高层的评价。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纯经济、纯技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对现实，反观历史，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使报告文学超越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为决策者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也为决策者制定某些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依然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此作品既在当时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晋城市交通局从编辑部一次提走 500 份，并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统上下级做了广泛推荐；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也从编辑部先后提取 1400 余册，发至所属部门），也应该对后来山西乃至全国公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的报告文学在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报告文学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脉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厉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么，赵瑜则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写作姿态和相对温和的话语策略：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

这种角色特点也延续在他的“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中。“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同时发表于 1988 年，这一年既是学界所谓的“报告文学年”，同时也是 80 年代报告文学走到最后辉煌的年头，而赵瑜的重拳出击则为这辉煌涂上了绚丽的一笔。整整 10 年之后，赵瑜又推出了《马家军调查》，但他显然也延续了前两部的问题意识：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强国梦》中赵瑜说：“今天体育方面的种种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责任。关键在于体制。”而在《马家军调查》的结尾部分，赵瑜又发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得到验证……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内容，有了干货。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这种表白让我们意识到，揭示计划经济

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声部。同时，通过体育界呈现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向高层进言，进而促进体制的转型或改革，也该是赵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诉求。他表面上做的是报告文学，但实际上做的却是政论文章。如此写作的好处是高屋建瓴，气魄宏大，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它在理性层面能迅速作用于人的公共意识，从而拓宽言说与思考的公共空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理性高于情感，思想大于形象，它们能对人形成某种震惊效果却很难在艺术感染力的层面让人折服。同时，由于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公共性，势必会对本来就不多的文学性构成某种挤压，结果，文学性便显得越发稀薄微弱。简言之，在“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的前两部中，公共性与文学性是不成比例的。直到第三部《马家军调查》问世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赵瑜像当时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进入到问题报告文学之中的。而由于赵瑜把交通问题、体育问题做成了报告文学，由于这些问题又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精神的大问题，所以，赵瑜的报告文学便能在同类的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具有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也成了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然而，作为时代的产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带着这一时代文学写作的通病，这就是公共性有余文学性不足。

文体创新：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据报告文学界的研究成果，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发表数量虽依然可观，但好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躲避现实前沿、对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作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而“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必然会抽空报告文

学的文体精神”。这一论述显然挑明了报告文学由变异而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赵瑜也进入了他的调整期。

往前追溯，其实早在80年代赵瑜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文学性了，只不过那时候他的想法很可能还不甚清晰，而落实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比如，1986年，赵瑜曾给评论家李国涛写信，信中说：“我的创作准备以及不多的实践，都没有在语言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致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不能征服更多的读者，继而又派生了青春短暂的急躁……几年下来，手忙脚乱，偏偏荒了语言。”赵瑜之所以会给李国涛写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后者的文章《文学不必退让》。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是“文学的优势在于语言”，面对电影电视的蚕食鲸吞，文学没必要退让自己的领地，因为再好的电视片也无法传达文学语言所描绘出来的神韵。这一观点显然给当时也在从事影视剧本写作的赵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让他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

如果依照严格的文学理论眼光来思考“文学性”（literariness），从文学语言入手显然是其正道。但打磨语言进而提升语言的文学品位虽然思路正确，却还不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高的全部问题。这样，除了语言还需要让报告文学具备什么样的文体特征，便成了赵瑜后来重点琢磨的对象。

在198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赵瑜虽然明确强调了文学性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当前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较差”，但究竟如何让文学性变得多起来，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1991年，在回顾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时，赵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一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而“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键。”这意味着赵瑜对80年代包括自己在内的报告文学作品已有了一个清醒的反思。而处理好主观理性精神与客观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打造报告文学文学性

的组成部分。此后，如何革除报告文学的积弊，如何对报告文学进行文体创新，也就成了赵瑜经常性的思考内容。到1998年《马家军调查》面世的时候，赵瑜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创新的思路已经清晰，他说：“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这意味着经过《马家军调查》的写作实践之后，赵瑜已明确了文体创新的方向。

90年代之后，整个知识界进入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整个文学界则开始“向内转”，“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当作家无法在公共性的层面有更大作为时，转而在文学性的层面上精雕细刻便成为必然之举。这种时代风尚既让赵瑜有了一个收心内视的机会，也让他拥有了沉潜发力的时间。而一旦他瞄准了文学性上的努力方向，他便既能对以往的写作进行纠偏，也能让公共性与文学性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调整和反思，从《马家军调查》开始，赵瑜已在追求公共性与文学性的最佳结合点。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中，赵瑜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作品是《马家军调查》（1998）和《寻找巴金的黛莉》（2009）。

《马家军调查》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寻找巴金的黛莉》则是通过精心结构故事，巧妙谋篇布局体现出它的文学性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巴金与黛莉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已被历史尘封，只有巴金写给黛莉的七封书信留存于世，它正需要作者去挖掘、充实和叙述。另一条是赵瑜本人“寻找黛莉”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由于寻找的艰难曲折，这个故事又派生出许多个小故事。于是，历史故事的打捞与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互交叉，大故事与小故事又彼此嵌入。这种故事套故事、悬念跟悬念，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

明的写法颇似侦探小说，让人捧读在手就不忍放下。人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题材的特殊，赵瑜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但在在我看来，这种写法显然也体现了赵瑜文体创新的一种思路。

像《马家军调查》与《寻找巴金的黛莉》这种文学性增强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呢？在我看来，《马家军调查》的公共性不仅是延续了80年代赵瑜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把对体制的批判推进到对于人的异化的批判。《寻找巴金的黛莉》的公共性则既是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也是对伟大作家道德人格的礼赞。在这一作品中，黛莉只是当年与巴金交往的众多读者中的普通一员，由于七封书信的发现，激发了作者对这位普通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有了作者的寻找。而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作者大面积接触普通人的过程，也是后辈作家向前辈作家遥遥致意的过程。因为寻找的艰难曲折，那些平时很难进入文学作品视野的平民百姓走向了赵瑜的笔端，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构成了赵瑜关注的目标。在此层面上，赵瑜仿佛成了“流浪汉小说”里的主人公，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了人间的世态百相，而那些小人物艰辛、坎坷的人生遭际又通过赵瑜的叙述，激发了读者的道德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在七封书信中与黛莉谈人生理想，谈读书心得，为黛莉解疑释难，与黛莉平起平坐的事实，又构成了作家的一种精神标高和人格典范，于是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赵瑜带领读者学习前辈作家的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精神境界升华、道德感与责任感共同提升的过程。作品中，赵瑜抚今追昔，不时会发出如下感慨：“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这种感慨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的对比之物，是让当代作家变得谦虚起来、不要盲目自大的清醒剂。而通过对前辈